两宋时期两浙路地区的建筑形制演变及区域互动关系研究 *

王书林　徐新云　徐怡涛‹1›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两宋时期两浙路地区的木构建筑、砖石塔、石刻及墓葬等材料出发，将其分为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两个区域，提取并整理建筑形制特点，进行建筑形制的分区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区域比较，讨论区域间互动关系，进而提出对建筑考古学分区的思考。

关键词　北宋　南宋　两浙西路　两浙东路　木构建筑　砖石塔

引言：问题的提出

两浙路为北宋时期的地方行政区，辖境约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苏省长江以南、茅山山脉以东的区域，包括润州（今镇江）、常州（今常州、无锡等地）、苏州、湖州、秀州（今嘉兴）、杭州、睦州（今建德）、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衢州、婺州（今金华）、台州、处州（今丽水）、温州，乃以五代时期吴越国疆域为基础，增加太湖以北的常州、润州。北宋一朝，两浙路基本在同一行政区内，仅于熙宁七年（1074）、九年（1076）有两次短暂拆分‹2›，至南宋时期，两浙路复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图一〕。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南宋时期的木构建筑形制与屋木画研究”（批准号：19YJC76010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宋建筑史料编年研究”（批准号：19ZDA19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前期调查和初步研究成果系经2009年度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研究资助支持。

‹1›　徐怡涛为本文通讯作者，电子邮箱：xuyt@pku.edu.cn。

‹2›　“熙宁七年，分为两路，寻合为一；九年，复分；十年，复合。府二：平江、镇江。州十二：杭、越、湖、婺、明、常、温、台、处、衢、严、秀。县七十九。南渡后，复分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一军，为西路；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婺、台、衢、处四州，为东路。”《宋史》卷八八，页1463，中华书局，2000年。熙宁九年五月“丙寅，诏复分两浙为二路。初，从沈括分路之请，不半载复合之，于是复分，明年五月复有诏合为一路。盖以财赋不可分，又已责监司分定巡历诸州县岁遍故也。初分在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复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复分，十年五月复合，今附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页6725－6726，中华书局，1979年。“熙宁七年，沈括言，‘欲乞分浙东西为两浙路转运使，于杭州置司，杭、苏、湖、常、秀、睦、润七州为浙西路，越、明、台、婺、温、衢、处七州为浙东路’，诏从之。《皇朝郡县志》载，元丰元年（1078），诏转运司通管二路提刑提举司，各分路置。象之按，今荆、淮、江、广诸路漕臣，皆分路自置，惟两浙以财赋合一，故共置一司，兼统两路，并得刺举。尚熙宁旧制也。”（宋）王象之

〔图一〕两浙路历史地图
改绘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页89、第6册页24－25、第6册页59－60，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五代时期吴越国


北宋两浙路

这一区域在唐代后期已逐渐成为天下粮仓，为军队提供粮食供给‹1›。五代时期，在钱镠的有序治理下，吴越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2›，而纳土归宋又使其免于战争破


南宋两浙西路、两浙东路

编著:《舆地纪胜》卷二，页49，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北宋的两次政区分合与熙宁变法有关，是两浙路地区监察和经济发展二者矛盾调和的结果，最终形成“以财赋合一，故共置一司，兼统两路，并得刺举”的做法。倪佳佳在《〈宋史·地理志〉两浙路考述》中有较为详尽的分析。这说明两个地区在北宋时期经济来往密切，但因交通不便，阻碍交流。倪佳佳:《〈宋史·地理志〉两浙路考述》，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旧唐书》卷一二三，页2391，中华书局，1975年。

“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三，页29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 苏轼《表忠观碑》:“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闻于道。”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七，页499，中华书局，1986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前揭《苏轼文集》卷三二，页916－917。

坏，地域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1]。特别是伴随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迁，这一地区因地处京畿而迅速崛起，成为南宋最为核心的区域[2]。

两宋时期两浙路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其建筑技艺也得到迅速发展。张十庆先生认为，“五代及宋以后或可称作是江南中心和江南时代的开始。宋代以后北方建筑上的许多技术的进步，多是在江南建筑的促进和影响下达到的。《营造法式》正是这一背景下的重要一环”[3]，强调了五代北宋以后江南建筑的地位。根据史料记载，北宋曾多次遣江南匠人进京建造重要建筑物[4]，从中也可知两浙路地区的营造水平之高。

因此潘谷西、傅熹年、郭黛姮、张十庆等先生均从江南遗构的建筑形制出发，认为江南建筑传统对《营造法式》的编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此外，两浙路地区建筑也与日本建筑关系密切，因此对这一地域建筑形制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理清建筑样式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历程，为分析南北方建筑及中日建筑的互动关系提供参考。

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两浙路区域内同一时期呈现出迥异的式样[6]。以存世较多的砖石塔为例，其平面布局有四方、六角、八角等样式，对形制年代学研究造成一定困难。有学者认为塔的平面形

‹1› “北宋熙宁时期，两浙路的水利田数、二税、上供布帛数、上供粮食均列全国第一，足以证明其经济地位和发展水平”。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 宋代卷》页62，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前揭《宋史》卷一七三，页2783—2784。

‹3› 张十庆：《〈营造法式〉的技术源流及其与江南建筑的关联探讨》，《建筑史论文集》第1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宋初，他（杭州人喻浩）主持修建汴梁开宝寺木塔。……其后，宋真宗建玉清昭应宫以奉玉皇大帝，规模十分恢宏，由宰臣丁谓任修宫使，‘尽括东南巧匠遣诣京’，又一次将江南建筑技艺带至汴京”。项隆元：《〈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页247—2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从《法式》的内容来考察，除了前述拼柱法以外，还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做法在江南很流行而在北方则很少见到，例如竹材的广泛使用、‘串’在木架中的重要作用、上昂的应用等”。潘谷西：《〈营造法式〉初探（一）》，《南京工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立国后在建设中就要利用南方较高的建筑技术，最后就会有一部分被吸收进逐渐形成的北宋官式建筑中。建国以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发现一些北宋初期的建筑物，既证明唐以来在这些地区已形成有特色的地方传统，也为宋代这些南方地方传统与北方建筑传统融合形成新的北宋官式提供了例证”。傅熹年：《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文物》1999年第10期。“南方所存的几个实例和南方宋代以后的建筑对于研究《营造法式》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如《营造法式》所列的厅堂式构架，采用月梁形抬梁式构架的建筑主要分布在江南，江浙地区建筑的若干细部处理也与《营造法式》所定者相同，如斗栱形制、双补间的安排、装修、七朱八白彩画，其中尤其是宁波保国寺大殿为代表，竟可找出十几处之多，这绝不是偶然的”。郭黛姮：《〈营造法式〉研究回顾与展望》，《浙东文化》2003年第1期。张十庆先生通过从江南构架形制和江南样式做法分析，认为《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有着相当的关联。前揭张十庆《〈营造法式〉的技术源流及其与江南建筑的关联探讨》。

‹6› 徐怡涛研究江浙地区元代建筑时，也提出这一问题。“‘江浙’以往被笼统地视为一个区域，但从［表一］中江、浙地区现存元代建筑看，苏州与浙江南部的建筑形制差别，远大于苏州与北方地区的差别，显然‘江浙’”并非一个共性的地区，所谓‘明初江、浙建筑式样’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徐怡涛：《从斗栱形制探析13至15世纪中国北方官式建筑与江浙营造的渊源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

态与时代有关，方形塔建设比较早，六角、八角偏晚[1]，但松江兴圣教寺塔、诸暨东化城寺塔、常熟方塔等却又将方形塔的建造时间从唐经北宋延续至南宋；有学者认为塔的平面或与塔的体量大小、营建便捷性有关，但中型体量楼阁式塔的平面和结构缺乏明显的逻辑对应关系[2]；也有学者指出六角塔、八角塔的流行地域不同[3]，故有学者提出似不宜以"江南建筑"一概而论苏浙建筑[4]。将五代至南宋时期不同平面的塔标示于图上，可见塔的平面分布呈现出区域集中的特点，这为建筑形制分区的进一步细化提供了线索〔图二〕。

我们重新考量两浙路这一区域，其于南宋时期分为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实承袭了北宋中后期的变法改革的分区。而熙宁变法将两浙路一分为二，是由于"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1071)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5]，即监司只在水运交通便利的浙西巡检，而不去崎岖难行的浙东山区，这也提示我们浙西和浙东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便利程度很可能也对其建筑形制的地域内延续和地域间传播产生影响。故本文先将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分列，整理和分析其建筑形制[6]，独立叙述其区域特征和发展历程，再合二为一探讨区域关系和区域互动。

‹1› "塔的平面，唐以前都是方形，五代起八角渐多，六角形为数较少"。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五版）》页165，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2› "汇总江南五代两宋楼阁式塔的实例，以统计学的方式进行推论，四边、六边或八边的选择应与塔身体量的大小、营建的便捷性有关(石塔因结构体系不同除外)。大型楼阁式塔平面较大，转折方便，常采用八边形，并多为双套筒结构；中型体量楼阁式塔或为八边，或为六边，或为双套筒，或为单筒结构，结构体系差异性大；小体量楼阁式塔则多为六边或四边，并多采用单筒结构"。刘杰：《湖州飞英塔的结构与形制研究》页75—76，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 "浙西八角塔较多，是因为浙西乃八角塔的起源地区，八角之风延续上百年，至于北宋时浙西之地仍多八角塔，乃习惯使然。而浙东地区，兴起造塔之风晚于浙西，大约在吴越后期。此时六角塔之尝试已然出现，不久即与八角塔分庭抗礼，至于北宋时浙东之地，乃纷纷兴起六角塔"。魏祝挺：《吴越国佛塔经幢通考以及形制分布的初步研究》页135，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4› "在论文调研的整个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出江南的地域特征，但这种建筑特征并不是简单的根据行政区划来确定空间的分布及变迁……具体而言，苏南与浙北有着共性，而浙南与闽北，浙西、浙中与徽州地区相似。因此，笔者更多时候甚至质疑'江南建筑'这个称谓究竟是否太过笼统，因为种种矛盾都指向一点，那就是苏南与浙江地区、浙江地区内部地域特征的不共性，包括建筑的构架精神，样式特征等，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仅仅简单以'江南建筑'来一概而论，但权衡之下却没有更合适的词汇来重新定义。……这导致建筑的地理位置不以行政区划为基准，也出现了边缘化区域，更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今日所见之局面。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下产生了当地的工匠流派，形成建筑行帮，工匠之间言传身教，长期保持流派的特色"。田志敏：《苏州旺墓村土地庙探析》页46，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5› 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页6175。

‹6› 包括南宋现存木构建筑、砖石塔、石刻及墓葬所反映的木构建筑形制，旨在通过对仿木构建筑形制的整理弥补木构建筑实例的不足。

〔图二〕两浙路砖石塔分布及分区示意图
图中红色为八角塔、蓝色为六角塔，黄色为方塔。后二图中红色分界线表示两浙西路与两浙东路的政区分界。



五代时期吴越国


北宋两浙路


南宋两浙西路、两浙东路

一　两浙西路建筑形制特征

两浙西路为南宋时期核心区域。本区内建筑结构较为复杂，细部变化丰富，其主要特点及时代演变如下：

1. 建筑整体

木构建筑平面形式呈现出从北宋时期简单的方形平面，向南宋时期复杂的带月台矩形平面及工字平面的转化‹1›，前者如苏州罗汉院大殿‹2›、角直保圣寺大殿‹3›为代表的方形殿堂，后者如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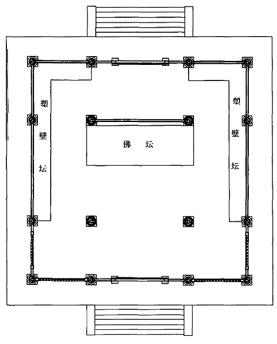
‹1›　这一转变很可能与南宋初年北人南迁有关。在北宋时期的宫殿建筑遗址中已出现大月台、工字殿等平面形制，可能成为北方地区的流行做法。

‹2›　张十庆：《苏州罗汉院大殿复原研究》，《文物》2014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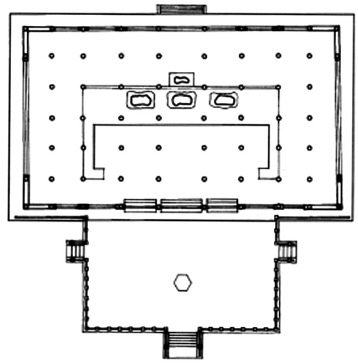
‹3›　陈从周：《角直保圣寺天王殿》，《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张十庆：《角直保圣寺大殿复原探讨》，《文物》2005年第11期。［日本］大村西崖：《塑壁殘影》，東京文玩莊，日本大正15年［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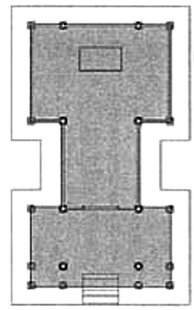
玄妙观三清殿‹1›为代表的带宽大月台的矩形平面，还有苏州斜塘土地庙这样的“工”字形平面‹2›。建筑构架形式基于目前了解的木构实例观察，在江南宋元建筑“方三间、八架椽、厦两架、‘井’字形厅堂构架、月梁造、大尺度心间”典型特征的基础上，罗汉院大殿出现减柱构架、厅堂副阶等复杂构架形式‹3›，而南宋时期的玄妙观三清殿殿身则呈现出明显的殿堂构架特征〔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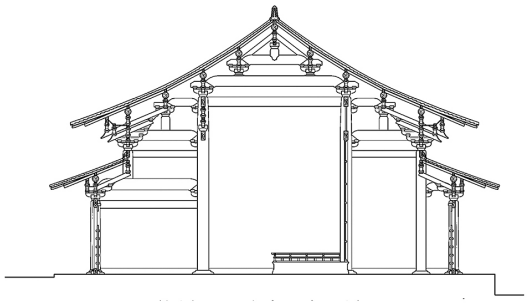
〔**图三**〕**两浙西路主要木构建筑平面及构架图**
1. 保圣寺大殿平面图　采自张十庆：《用直保圣寺大殿复原探讨》页81
2. 玄妙观三清殿平面图　采自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页519，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3. 斜塘土地庙大殿平面图　采自田志敏：《苏州旺墓村土地庙探析》页39
4. 罗汉院大殿剖面复原图　采自张十庆：《苏州罗汉院大殿复原研究》页92
5. 玄妙观三清殿剖面图　采自郭黛姮：《南宋建筑史》页2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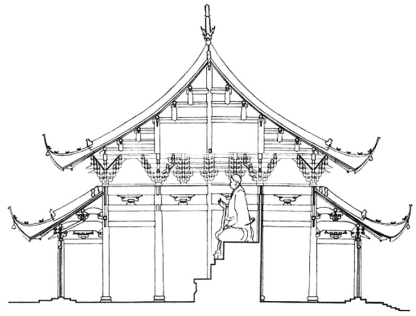


1. 保圣寺大殿平面图


2. 玄妙观三清殿平面图


3. 斜塘土地庙大殿平面图


4. 罗汉院大殿剖面复原图


5. 玄妙观三清殿剖面图

塔之平面在五代至两宋时期多为八角形，形成了该地区的地域传统‹4›。从现存砖石塔的整体形象来看，石塔与砖塔的基座在塔身占比、构造形制方面呈现出明显不同。石塔多以高耸的须弥座为基，而砖塔（含砖木混合结构塔）则大多整体建设于宽大的低矮台基之上。这样的差异一方面与砖石塔的建筑材料和体量有关，即石塔偏小，有学者认为其实乃雕塑作品；而砖塔较大，有的还施副阶和逐层回廊，可以登临，因其建筑功能和结构的需要而建造稳定、牢固的宽大基座。另一方面，或许砖石塔的构造与其功能或寓意有所关联。石塔不可进入和登临，绕塔礼佛，故其表面刻画佛龛、造像、经文，是佛的象征，因此下部使用高台基座，大多用须弥座‹5›；而

‹1› 刘敦桢先生对玄妙观三清殿的历史沿革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一般认为现存建筑大体为南宋淳熙六年（1179）之物。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刘敦桢文集（二）》页286－28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2› 苏州斜塘土地庙现存建筑为“T”形平面，但根据现场柱础、台基等遗存分析，原应为“工”字形平面，且该平面布局应反映了南宋时期所建设的土地庙基础。前揭田志敏《苏州旺墓村土地庙探析》，页19－20。

‹3› 前揭张十庆《苏州罗汉院大殿复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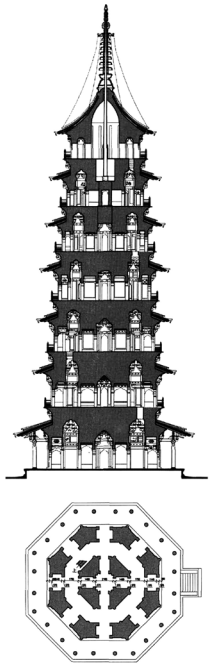
‹4› 这一地区也有如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常熟崇教兴福寺塔等方塔，但就现存砖石塔实例来看，八角塔明显占据主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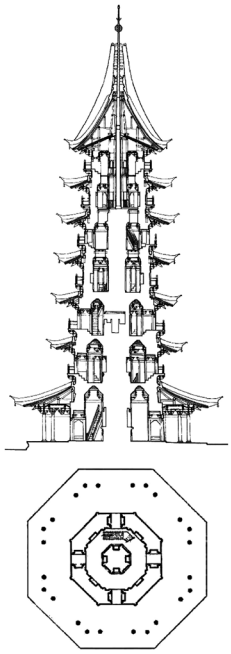
‹5› 镇江甘露寺铁塔也与石塔类似，不可登临，只能绕塔礼佛，其底部也做须弥座台基。根据1960年甘露寺塔基发掘可知，“由焦巽出钱200万铸造铁塔，熙宁九年（1076）五月开工，元丰元年（1078）四月完成”，郑金星、刘受农、杨荣春、梁白泉：《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页314，《考古》196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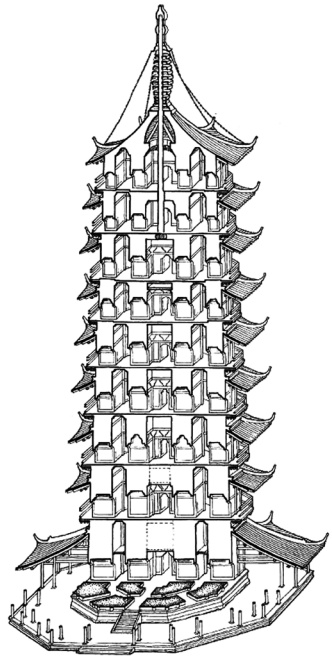
〔图四〕两浙西路多边形塔基座及塔身比例图
1. 杭州闸口白塔　立面图引自梁思成:《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梁思成全集(三)》页29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平面图引自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杭州闸口白塔》页52图版十三,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
2. 杭州灵隐寺石塔　采自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灵隐管理处编:《灵隐寺两石塔两经幢现状调查与测绘报告》页52、56,文物出版社,2015年
3. 苏州云岩寺塔　采自张颖:《苏州云岩寺塔复原研究》页45、46,《建筑史》第二十五辑,2009年
4. 苏州瑞光塔　采自郭黛姮:《南宋建筑史》页219、221、231
5. 苏州报恩寺塔　采自郭黛姮:《南宋建筑史》页231


1. 杭州闸口白塔


2. 杭州灵隐寺石塔


3. 苏州云岩寺塔


4. 苏州瑞光塔


5. 苏州报恩寺塔

大部分砖塔可以进入室内，在室内礼佛，故砖塔外檐只是建筑空间，不设须弥座[1]。至南宋时期，须弥座在砖石塔中变得常见，如杭州六和塔[2]在塔每层的内墙外壁和内、外墙甬道两侧的壁龛下都设有砖质须弥座，而苏州报恩寺塔[3]甚至在副阶外围和塔身外围均设须弥座〔图四〕。

2. 柱枋

外檐立柱主要有两类，最为常见一类以圆为基础断面，常见者为圆柱，重要建筑可用瓜楞柱，如罗汉院大殿、湖州飞英石塔等；另一类以方为基础断面，包括抹角方柱或八角柱，北宋时期多用抹角方柱，即方柱四角抹出斜面，抹角较小，如罗汉院双塔，南宋时期抹角增大，形成八角柱式样，如苏州报恩寺塔、玄妙观三清殿等。

外檐柱下多用础𥎦一体的石础，与上述柱形相对应有圆形𥎦、瓜瓣𥎦、八角𥎦。北宋初年罗汉院大殿遗址副阶为带石𥎦覆盆柱础，而其殿内柱础与北宋保圣寺大殿相似，均为石础木𥎦。至北宋天圣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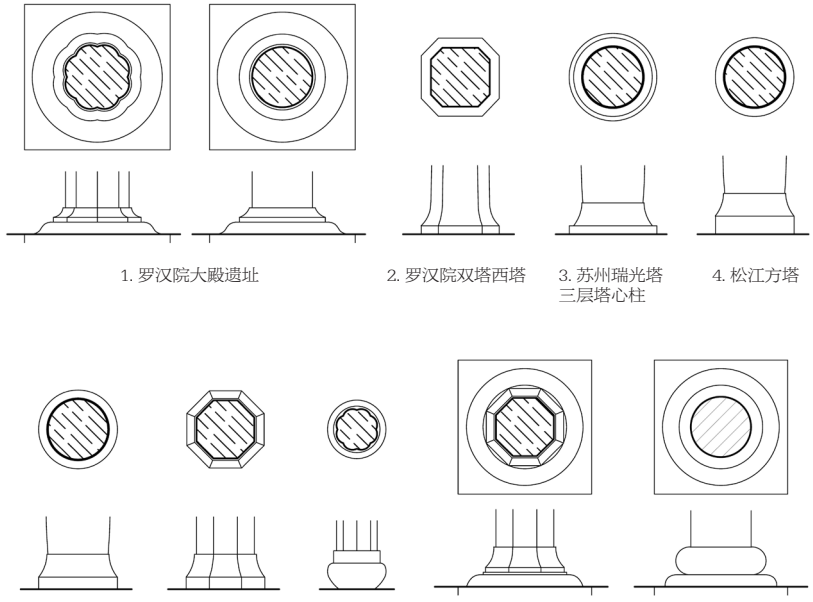
‹1›　苏州甲辰巷砖塔或因砖塔较小，不可进入室内或登临，而以绕塔礼佛，因此其底座所占塔身高度的比例远高于其它楼阁式砖塔。

‹2›　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计划》,《梁思成全集》第二卷，页355，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王士伦:《杭州六和塔》,《文物》1981年第4期。根据前辈学者研究，可知六和塔建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间，明清皆有维修。其塔身砖结构应还保留了南宋时期的面貌。

‹3›　“高宗建炎四年(1130)，金人蹂躏平江，塔复毁。绍兴间，僧大圆重建，亦祇九层。其后元至顺，明弘治、隆庆、万历，清康熙凡数度修治，至太平天国战争后，塔复倾圮，光绪二十六年(1900)僧继和重修一新……足证塔之砖造部分——即外壁与塔心——确为南宋绍兴间僧大圆所构。”前揭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页300－303。再结合《(民国)吴县志》卷五九，页11，“北寺塔砖二，一绍兴乙亥，一无年月”的记载，可知塔的重建时间当约在绍兴乙亥，即绍兴二十五年(1155)。

的苏州瑞光塔塔心柱‹1›下即已出现单独使用的櫨形础，北宋熙宁以后至南宋时期櫨形础则愈加常见，如松江兴圣教寺塔‹2›、苏州报恩寺塔、梅李聚沙塔等，櫨形础底部逐渐变高，甚至出现鼓形〔图五〕。当然覆盆带櫨石础也一直沿用至南宋时期，如玄妙观三清殿、斜塘土地庙的外檐柱下均为覆盆石础带八角石櫨。

〔图五〕两浙西路柱形及柱础形制演变图
2号罗汉院双塔西塔因无法登塔近距离观察柱础，故图中柱础形制根据前揭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页298改绘



柱间阑额断面多呈矩形，两端卷杀入柱，至角不出头，常呈现出栌斗底宽于阑额的形象；也有作月梁造者，补间铺作底部与阑额呈咬合关系‹3›。建筑外檐柱顶很少用普拍方，北宋时期多层塔的平坐层则可偶见普拍方，如苏州云岩寺塔、江阴兴国寺塔‹4›等，与《营造法式》中“平坐铺作下用普拍方”‹5›的记载可对应。南宋以后，仿木构砖石塔外檐柱头仍不见普拍方、只偶在平坐层使用。不过，从玄妙观三清殿的外檐和殿内柱顶出现兜圈的普拍方，湖州风车口宋墓‹6›中也见至角出头、并作海棠线装饰的普拍方，至元代真如寺大殿、东山

‹1› 根据瑞光塔第三层塔心柱发现大中祥符二年和三年的铭文砖、如来像背面天圣八年舍石佛的墨书题记等材料，认为瑞光塔的建造时间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天圣八年(1030)前后。张步骞：《苏州瑞光寺塔》，《文物》1965年第10期。 有关瑞光塔的建造和修建的史料，可参见王书林：《两宋时期苏州瑞光塔的修缮工程》，《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1期。认为瑞光塔建造时间为北宋景德元年至天圣八年(1004—1030)，北宋宣和间由朱勔捐修，宋末焚毁严重，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1184—1186)重修，其砖造塔心部分应为北宋原物。

‹2› “按兴圣寺在府治之东南，五代汉乾祐二年(949)镇东将军张司空子仁舍宅所建也，明颂法师蕴公为开山始祖，寺三门之外甃石为梁，步梁而西，营立宝塔，功垂成而蕴逝，逮宋熙宁间，赐紫沙门希玠与如讷、如礼协力，踵成前志，为塔九层，纵广正等壮丽可观，神光焕发”，《重修塔记》，摘自(正德)《松江府志》卷一八，页12。另在1974年发现北宋地宫，发掘者认为“石函中的瘗藏品及地宫的砖室建筑与其他的时代一致，确系北宋无疑”，但“南宋初年有人曾撬开过栱顶砖头，安置了泗州大圣坐像，同时放入包含有一枚‘建炎通宝’的八十七枚铜钱”。上海博物馆：《上海市松江县兴圣教寺塔地宫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2期。故可将松江兴圣教寺塔的建塔时间定为北宋熙宁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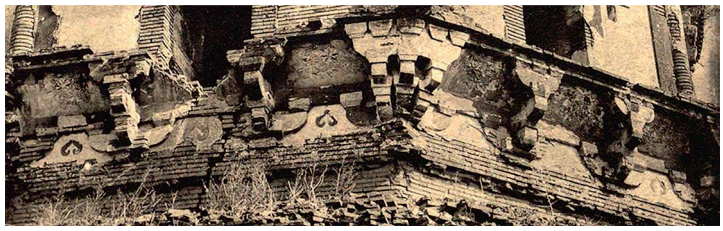
‹3› 张十庆：《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页159、161，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云严寺塔应建于钱弘俶十三年己未(959)，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刘敦桢：《苏州云严寺塔》，《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7期。其后，在塔内发现大量文物，“确定了建塔的时期(始建于公元959年——周显德六年己未，完成于公元961年——宋建隆二年辛酉)”。钱镛、范放、黄正祥：《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5› (宋)李诫编修，梁思成注释：《营造法式注释》页13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宋墓》页69，科学出版社，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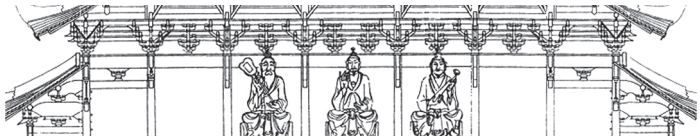
〔图六〕两浙西路普拍方施用位置示意图
1. 苏州云岩寺塔　采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图版)》(第四辑),法藏馆,1939年,Ⅳ－17(2)
2. 江阴兴国寺塔　采自江阴兴国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材料
3. 苏州玄妙观三清殿　采自董寿琪、薄建华编著:《苏州玄妙观》页123,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



1. 苏州云岩寺塔



2. 江阴兴国寺塔



3. 苏州玄妙观三清殿

轩辕宫正殿等则出现T形断面的阑额普拍方组合的情况，可推测至南宋中后期，外檐柱头出普拍方可能已开始流行〔图六〕。

3. 铺作

从铺作布局看，北宋至南宋初年，凡五铺作者，最多于明间施两朵补间铺作‹1›，用四铺作者，则只施一朵补间铺作；南宋绍兴(1131－1163)以后，施四铺作者，也开始使用补间铺作两朵的做法，其铺作数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进一步对多层塔的铺作布局进行比较，北宋时期，凡塔施平坐，常见平坐铺作减跳，即檐下用五铺作，平坐用四铺作；檐下用四铺作，则平坐用叠涩‹2›。南宋以后，平坐铺作皆不再减跳，与檐下铺作出跳数相当的做法得到普遍流行。

从铺作与柱梁的交接关系看，与第一类最为常见的圆柱或瓜楞柱形相对应，柱头施圜斗‹3›，补间出变化，或施讹角斗‹4›，如浙江杭州灵隐寺双塔‹5›、江苏角直保圣寺大殿、湖州飞英石塔等，或施方斗，如江阴兴国寺塔‹6›、松江兴圣教寺塔等；

‹1›　五铺作常见两朵补间，但也见用一朵者，或与面阔大小有关。

‹2›　北宋时期也有平坐不减跳者，如苏州虎丘云岩寺塔、苏州瑞光塔、镇江甘露寺铁塔等，可能与更小的区域特色有关。

‹3›　该区域建筑柱形用圆柱，而柱头用方形栌斗的组合较为少见，仅见于楞伽寺塔、苏州瑞光塔塔心柱、虎丘二山门等少数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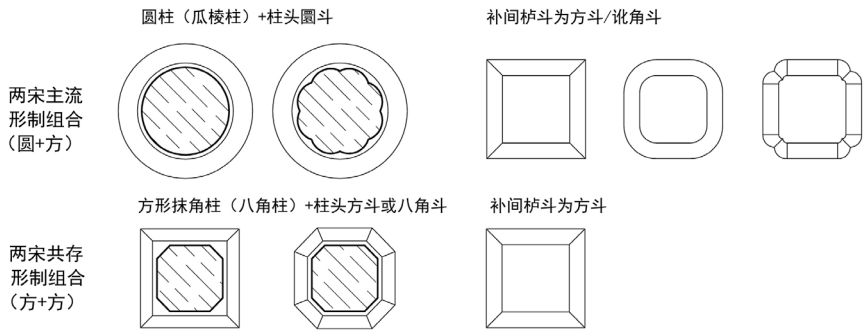
‹4›　补间施讹角斗的做法在两宋时期的砖石塔和木构建筑上较为常见，与《营造法式》的记载一致。“如柱头用圜斗，即补间铺作用讹角斗”，前揭李诫编修，梁思成注释《营造法式注释》，页119。

‹5›　前揭梁思成《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页302。“可以断这双塔的年代为建隆元年(960)重兴灵隐寺时或其后数年间所造”。

‹6›　“太平兴国寺，南街之西，宋建，以年号名。大观初灾，浮屠七级仅存。元重建。至正庚申兵废。洪武十七年(1384)重建，正统间修浮屠，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朱家相捐修，义民金态董役。锄地得三十金，献助创殿”。(崇祯)《江阴县志》卷一，页95。“兴国寺，在邑之南街，宋太平兴国中建，遂沿其名，元大观初烬于火，惟浮图七级”。《重修兴国寺浮图记》，(道光)《江阴县志》卷二三，页4。该砖塔塔身大体为北宋早期原构，但壶门等装饰部分可能为后世改修。

与第二类方形抹角或八角柱形相对应，柱头补间皆施方斗，如罗汉院双塔‹1›、玄妙观三清殿等〔图七〕，还有在八角柱上使用八角栌斗者如苏州报恩寺塔。内柱上施插栱承梁或额枋的做法在这一地区两宋时期建筑中较为常见，如江阴兴国寺塔、瑞光塔、保圣寺大殿等。外檐施插栱的做法仅见于护珠塔和灵隐寺双石塔的平坐铺作。

〔图七〕两浙西路柱形及栌斗形制组合分析图



从铺作与檐部交接关系看，以令栱承撩檐枋，不施耍头为这一地区北宋时期的主流形制。南宋绍兴以后开始出现爵头状耍头，见于杭州六和塔、湖州飞英塔木塔内部，耍头出头作单材与令栱相交，上施齐心斗。本区内缺少南宋中期的实例，但从南宋后期的常熟方塔‹2›，以及元代苏州东山轩辕宫、上海真如寺大殿均使用耍头来看，南宋后期以后耍头很可能较为普遍施用。对于多层塔的平坐层，自北宋天圣以后，平坐层常不施令栱，而直接以出跳承托，如苏州瑞光塔、松江兴圣教寺塔等。南宋以后大多承继北宋以来平坐层作斗口跳的做法，也偶见有出平坐出令栱的情况，如常熟梅李聚沙塔‹3›〔图八〕。

从铺作的形制组合来看，北宋前期现存实例可见铺作数、杪昂组合、偷心或计心造与扶壁栱做法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即若四铺作单杪，扶壁用单栱素枋；若五铺作双杪（偷心造或计心单栱），扶壁用单栱素枋交叠；若五铺作单杪单下昂偷心造，扶壁用重栱素枋上叠单栱素枋。这样的做法与《营造法式》的规定相同‹4›。但从北宋熙宁以后，五铺作双杪扶壁使用重栱承枋的形式逐渐流行，如松江兴圣教寺塔、镇江甘露寺铁塔(偷心造)。至南宋绍兴年间，扶壁重栱的做法更加流行，甚至出现四铺作扶壁用重栱的做

‹1› 西塔发现宋人题记，“双塔乃太平兴国七年（982）岁次壬午建，□王氏家一力所成，至今绍兴乙卯（1135），已涉一百五十三载。缘金人犯城，寺宇夷毁，唯此二塔□□□□比丘师祖慧（惠）先等九人，戮力募缘，次第修整，时绍兴五年岁在乙卯三月十三日，同修宝塔比丘□□□文上用记岁月矣，刊字比丘”，且发现有“壬午四月十八日已卯记”的砖铭。前揭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页296。钱镛：《苏州双塔修整中的新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二塔对峙，俗名双塔寺，……是院肇唐咸通，逮本朝雍熙创造双塔，至道初赐以御书，遂更今额”。（绍定）《吴郡志》卷三一，页19。“双塔，宋雍熙中，判司王文罕建，并舍田五百八十亩，今祀文罕为伽蓝神，兄弟三人并有像，其墓在寺内东隅，冢甚高，人不敢近，其地本名王判司巷。”（民国）《吴县志》卷三二，页27。综上，“壬午”砖铭与太平兴国七年可对应，王判司也可与“王氏家”对应，可知砖塔塔身主体应建于太平兴国七年至雍熙年间（982－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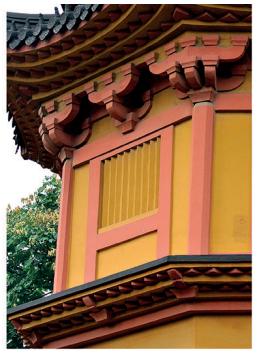
‹2› “东塔崇教兴福寺，在县东北，宋建炎四年僧有名文用者，谓邑客山高主位低，请立浮屠以镇之，令李闓之然其说，工未毕而僧卒，咸淳间僧法润撤遗构重建，高九级，江东诸寺浮屠此最坚完，规制峻整，国朝洪武八年（1375），僧净惠重修，迨今每敝辄修之”。（嘉靖）《常熟县志》卷一〇，页18。

‹3› 黄滋、章忠民：《常熟聚沙塔维修设计谈》，《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根据该维修设计报告，腰檐铺作和平坐铺作均为直接依据遗存修复，应保持了木构建筑形制的准确性。

‹4› “（泥道栱）若斗口跳及铺作全用单栱造者，只用令栱”。“五铺作一杪一昂，若下杪偷心，则泥道重栱上施素方，方上又施令栱，栱上施承椽方”。前揭李诫编修，梁思成注释《营造法式注释》，页91、128－131。

〔图八〕两浙西路檐下及平坐层铺作形制对比图
1. 苏州云岩寺塔　2. 罗汉院双塔西塔
3. 江阴兴国寺塔　引自江阴兴国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材料　4. 松江方塔
5. 镇江甘露寺铁塔　引自罗宏才主编：《佛教艺术模式与样式》页219，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
6. 湖州飞英石塔


1. 苏州云岩寺塔


2. 罗汉院双塔西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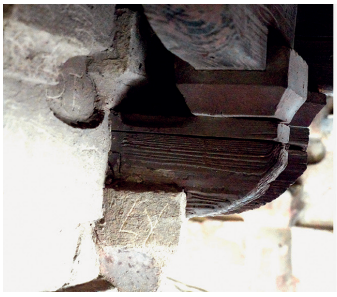

3. 江阴兴国寺塔


4. 松江方塔


5. 镇江甘露寺铁塔


6. 湖州飞英石塔

〔图九〕斗栱出跳用材
左为瑞光塔出跳单材，右为玄妙观三清殿出跳足材





法，其后扶壁重栱便成为扶壁栱的主流形制，这或许与计心造和计心重栱的广泛使用有关[1]〔图八〕。

从铺作构件形制来看，北宋时期保圣寺大殿柱头出跳华栱用足材，补间出跳华栱用单材[2]，与《营造法式》的规定一致。再结合北宋砖石塔的情况，观察其铺作是否在泥道栱上施齐心斗，可判断其使用足材还是单材，有柱头作足材、补间作单材者，如虎丘云岩寺塔，更多者为柱头补间皆用单材，如罗汉院双塔、江阴兴国寺塔。南宋以后则逐渐流行出跳皆用足材，不用齐心斗的做法[3]。铺作若出昂，昂身作琴面昂，下多施双瓣华头子，实例中还可见上昂类构件〔图九〕。

4. 门窗

两宋时期门窗样式主要为版门、破子棂窗。多层塔所表现的门框（龛框）样式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趋势。五代至北宋前期壶门曲线刻为内凹多曲，曲线向两侧伸展。在砖塔中壶门做法则是多层砖叠涩伸出，单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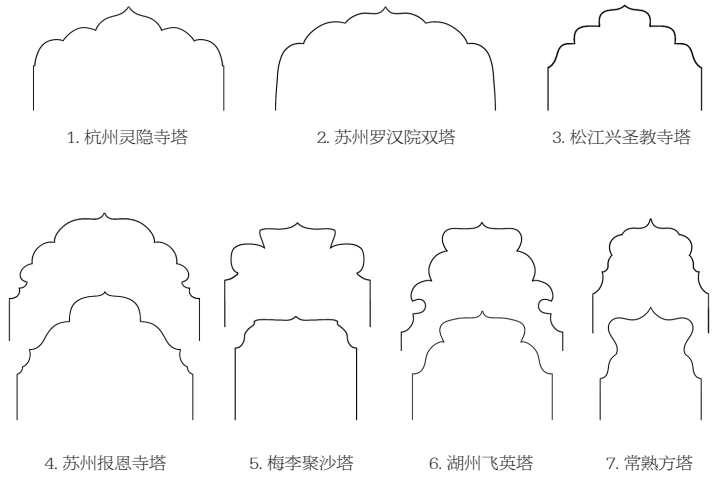
‹1›　这一趋势与徐怡涛先生所指出的从单栱造向重栱造发展的序列一致。徐怡涛：《公元七至十四世纪中国扶壁形制流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2›　张十庆先生指出：“《营造法式》明确规定柱头铺作华栱为足材，补间铺作华栱取单材。但考同期北方实例，则柱头、补间几皆用足材。而《营造法式》这一规定唯可见于江南，如宋初的保国寺大殿，以及虎丘二山门和延福寺大殿，其柱头铺作华栱用足材，补间华栱用单材，完全同于《营造法式》。”前揭张十庆《〈营造法式〉的技术源流及其与江南建筑的关联探析》。

‹3›　南宋前期还保持出跳用单材的做法，如杭州六和塔（1152—1165）、飞英石塔（绍兴年间）等。这一形制可能因历代修缮而改变原貌。因此应特别注意观察不易改变的砖构部分，若砖构扶壁泥道栱中心施齐心斗，则出跳为单材，若不施齐心斗，则出跳多为足材。从砖结构扶壁栱不施齐心斗，可知飞英木塔出跳应为足材。同理，如崇教兴福寺塔，虽木构出跳皆为单材，但扶壁无齐心斗，故推测其原设计为足材出跳。

有砍杀，并以灰浆抹出圆滑连续的曲线。北宋熙宁年间的兴圣教寺塔壶门形象出现变化，顶部第一段曲线两端略内收，大致呈宝盖的样式，底部曲线出现不用内凹，而用外撇的形象。南宋绍兴以后，壶门形象进一步改变，上部宝盖两端继续内收，甚至呈底小顶大的倒梯形，不如北宋时期的壶门顶部曲线舒展，下段或延续北宋出现的外撇曲线，或出现向上向内卷曲的内凸曲线。这样的变化或许与砖构挑出距离受限有关〔图十〕。

〔图十〕两浙西路壶门曲线示意图
作者绘



5. 小结

综上可知，两浙西路地区建筑平面从北宋时期的简单方形，至南宋时期出现带月台的矩形平面和工字平面，殿内构架常用前后对称构架。塔之平面常见八角形，塔多作宽大台基、施平坐层、可登临的楼阁式塔。本区内建筑形制有两次比较大的发展时期，一是北宋天圣至熙宁年间，出现了独立柢形础，壶门样式也发生变化，二是南宋以后，建筑形制与之前有着明显差异，普拍方、爵头状耍头等新的构件开始出现，并在南宋中后期开始逐渐流行；补间铺作数增多、补间出跳施足材栱，扶壁皆用重栱，平坐铺作皆不减跳，壶门形制进一步变化，愈渐繁复。这些建筑形制的变化，一方面与社会经济发展、建筑技术的改革和进步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与两宋之际北人南迁有关。

二　两浙东路木构建筑形制特征

两浙东路地区建筑结构相对简单，形制较为纯粹，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

1. 建筑整体

木构建筑平面形式宋元时期一直保持小型木构殿堂方三间的做法‹1›，如宁波保国寺大殿‹2›、金华天宁寺大殿‹3›、武义延福寺大殿‹4›。从这几座木构建筑观察，建筑构架形式符合“八架椽、厦两架、‘井’字形厅堂

‹1› “推测宋元时期中小型佛殿以方三间为一般形式，其平面形式可以武义延福寺大殿为代表，由此上溯并根据日本实例分析，南宋小型佛殿亦基本同此，也就是说，方三间或方三间带副阶的形式是江南宋元中小型佛殿最基本的形式。”前揭张十庆《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页108。

‹2› 郭黛姮、宁波报国寺文物保管所编：《东来第一山——保国寺》，文物出版社，2003年。

‹3› 陈从周：《金华天宁寺元代正殿》，《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4› 陈从周：《浙江武义县延福寺元构大殿》，《文物》1966年第4期。

构架、月梁造、大尺度心间”的江南宋元建筑典型特征。殿内皆施鹰嘴蜀柱，蝉肚绰幕的做法仅见于宁波保国寺大殿。此外，不同于两浙西路的“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的对称构架，两浙东路主要用“八架椽屋前三椽栿后乳栿用四柱”的不对称构架，突出前廊空间〔图十一〕。

塔之平面，唐至五代时期为方形或八角形，如宁波天宁寺东西双塔、义乌双林铁塔‹1›，至两宋时期，塔平面以六边形为主流形制，偶见方形。砖塔基座以高基座（或须弥座）和低矮宽大台基并存，其中高基座多用于不可登临的塔，如栖真寺五佛塔‹2›、台州瑞隆感应塔‹3›、宝胜寺双塔‹4›、临海龙兴寺千佛塔‹5›等，塔

‹1› （清）许乾：《重修双林铁塔记》，“（朱禄）见双林寺宇巍焕，僧舍繁华，诚不虚大士之道场。以为梁木必有坏时，不若镇以铁塔，令后人观塔存而寺亦因葺之而不废。遂于山门内两边，捐资鸠工，凿两方池，各铸铁塔，竖立于其中，与宝刹并峙”。另有朱禄《铁罗汉像记》记载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冶金铸罗汉像十八尊授予子孙十八人，故推测双林铁塔约也建于同期。朱中翰：《双林寺考古志》，《文澜学报》1937年第3期，收录于张曼涛主编：《中国佛教寺塔史志》，《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59辑，页77－96，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2› “栖真寺，在罗阳，宋嘉定间僧思齐建。旧志，按大日寺砖文即有栖真寺，疑非始自嘉定，或即嘉祐之误欤，砖文僧见齐未知即思齐否？”（民国）《平阳县志》卷四六，页15。根据栖真寺出土《重建塔志》记，“凤林栖真寺建自周广顺年间（951－953），以石琢五佛塔于放生池旁，塔成而寺不利，遂坏之”。遗址上还遗存有雕凿于宋嘉定元年（1208）的石马槽，以上资料并见于苏义惠：《平阳栖真寺宋代五佛塔》，《东方博物》第48辑，页62－7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其中《重修塔志》碑现立于五佛塔旁。可知塔建于五代广顺年间，或于南宋嘉定间有过修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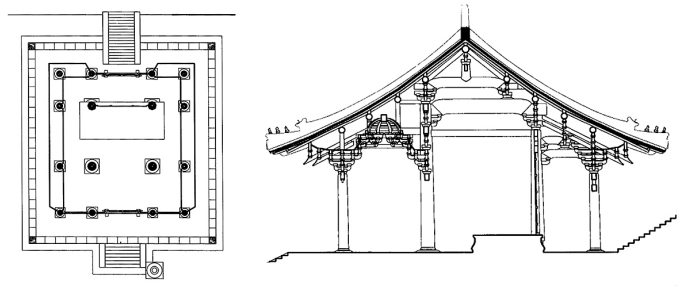
‹3› “兴善院，在县东南三里，旧名瑞隆感应塔院，本僧德韶建。国朝大中祥符元年（1008）赐今额，俗呼山奥寺，宣和中毁于寇，绍兴二十八年（1158），僧文异新之。”（嘉定）《赤城志》卷二八，页5。九峰寺，在县东三里，宋开宝间僧得韶建，名瑞隆感应塔院，祥符元年赐额兴善，俗呼山岙寺，宣和中毁于倭，绍兴二十八年重建。”（万历）《黄岩县志》卷七，页5。“1983年黄岩博物馆对瑞隆感应塔的塔基与底层进行维修，发现了一块有印模的塔砖，上有铭文‘建隆四年（963）岁次癸亥六月□日’”。杨松涛：《黄岩瑞隆感应塔及其佛造像》，《东方博物》第68辑，页29－37，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综上，可知瑞隆感应塔应建于北宋建隆四年至开宝年间（963－976年）。

‹4› 1984年，维修东塔过程中，在第二层北面壁龛内出土《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一方，记录有建塔和修塔时间，分别为乾德三年（965）建塔、天禧二年（1018）重修、建炎二年（1128）再次重修。陈余良：《浙江平阳宝胜寺双塔及出土文物》，《东方博物》第23辑，页79－83，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据《平阳县志》：“钱仓四塔，俱在宝胜寺前，其一已圮，尚存三残塔，光绪十六年（1890）风坏塔尖，堕一铁镬，镌有靖康年号（1126－1127）”，（民国）《平阳县志》卷五四《古迹志三》页1。结合塔的形制，认为现存宝胜寺双塔应为南宋建炎重修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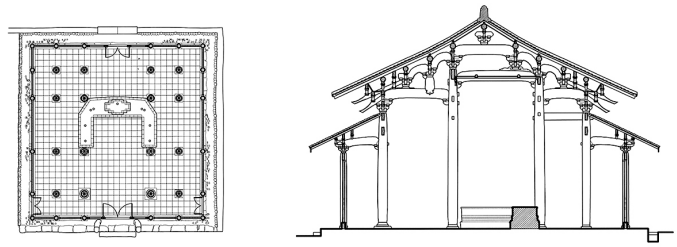
‹5› 彭连生先生详细梳理了临海千佛塔的研究史，根据铭文砖确定了临海千佛塔的建造年代为元大德三年（1299）。彭连生：《以临海千佛塔新发现铭文砖试论其建成年代及宗教功能》，《东方博物》第61辑，页77－87，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身立面常设佛龛[1]；宽大基座则用于可进入或登临的塔，如龙德寺塔[2]、义乌大安寺塔[3]、绍兴大善寺塔[4]等。与两浙西路相似，塔基形制可能反映了塔的不同类别。总体而言两浙东路塔的规模小于两浙西路，特别是在南宋时期，与两浙西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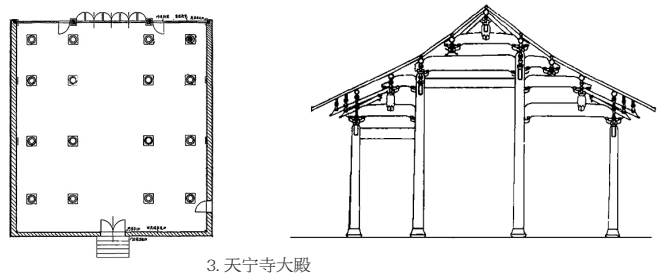
〔图十一〕两浙东路宋元木构建筑平面及构架
1. 保国寺大殿　采自郭黛姮等:《东来第一山——保国寺》页87、80
2. 延福寺大殿　采自黄滋主编:《元代木构延福寺》页256、260，文物出版社，2013年
3. 天宁寺大殿　左图采自陈从周:《金华天宁寺元代正殿》；右图采自《东来第一山——保国寺》页121



1. 保国寺大殿



2. 延福寺大殿



3. 天宁寺大殿

‹1›　松阳延庆寺应是两种塔的混合体，一方面塔身下设须弥座，一层全为佛龛，人不能从一层入塔；另一方面，塔也可登临，在副阶设楼梯上二层，故其副阶不设须弥座。这样的设计与苏州瑞光塔非常相似。

‹2›　沙门自闲:《龙德教寺修塔记》，“浦阳邑东南一里，有吴赤乌中龙德寺，是为观音僧伽二大士灵灵感道场。宋天圣乙丑(1025)，永康胡则捐钱百万，陈公养施砖千灶，建塔山巅。七层六面，周遭栏楯，金壁丹垩，类众宝合成。……花封蚁垤，数千百家，出入浮屠影中，诚此邑之壮观也。宣和岁辛丑(1121)，隣寇煽殃，屹立烈焰中不坏，信士朱宠等修之。宝祐甲寅(二年，1254)，寺僧子豪重修，垂四十载，大朝至元壬辰(至元二十九年，1292)，忽一夕大雨，震电及霁，势若微侧，岂天龙以旧观未还，有所警而然邪？住持文启叹曰：‘三灾已定，四相靡常，我辈岂容少懈？’与其徒妙思、妙净，倾衣裾募幢信，竭乃心力，固本而正。其末张忠厚等施白金饰轮之表，至于大雄□殿、圆通宝阁、堂室门庑、甃阶石道，粲然一新。……大德九年(1305)龙集乙巳春三月辛酉日记”。(康熙)《浦江县志》卷一一，页5－7。其第四层砖上发现题刻“皇宋天禧元年(1017)六月一日，蝗虫届邑，往来五天，不伤禾苗，因诉道场乃归”，《龙德寺塔》，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浙江文物简志 浙江简志之四》页69，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即知塔的时间年代为天禧元年至天圣三年间(1017－1025)，其后南宋宝祐、元大德皆有重修。

‹3›　关于大安寺塔的年代，有一定争议。过去认为是大观年间建设，主要源于历代志书的记载。如：“大安教寺，县西一百五十步绣湖心之柳洲。……唐咸通八年(867)建。宋治平赐额。大观三年(1109)，徐秉哲改为僧寺，徙置今所，有塔五级。”(康熙)《义乌县志》卷一七，页12。“按：寺塔旧志未详何代何人与建。今于塔中得废砖三，一云‘庚寅岁建’，一云‘孝妻王氏追荐故夫’，一云‘省干吴忠翊速生天界’。考大观三年己丑移寺，当是四年庚寅建塔，存此以备参考。”(嘉庆)《义乌县志》卷一八，页5。金佩庆先生撰《破解大安寺塔的身世之谜》认为，塔建于南宋乾道六年庚寅岁(1170)。张金龙先生认为，“大安寺塔建于宋大观四年(1110)，于宋乾道六年由吴若古(即吴忠翊)之妻王氏主持首次修塔”，相关研究见于张金龙:《首次修缮大安寺塔时间考》，《义乌方志》2009年第2期。

‹4›　“(大善寺条)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寺僧不戒于火，一夕煨烬，惟罗汉天王堂、浴院、经院、库堂仅存。寺有塔，亦俱焚，或发其塔中地，得石刻，乃越州龙兴寺。宋太始元年，唐大中元年(847)造塔，大宋淳化三年(992)十一月火焚，塔寺俱尽，景德元年(1004)重建，石刻中间多断阙，不可尽读，案龙兴寺与今龙兴桥相近，或谓提举廨舍是也，疑龙兴塔既焚，后人取废塔所葬舍利佛骨，益以他舍利葬于大善塔耳，以栋上字观之，则大善自建寺以来未尝有被焚之事，亦未尝名龙兴也”。(嘉泰)《会稽志》卷七，页15。“明永乐初，寺僧重修，寺塔复焕然(旧府志)；国朝康熙八年，僧万休同邑人重修(旧志)”，(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四，页4。另据资料介绍，塔身内壁砖块上发现有“绍定戊子(1228)重修”字样。出自章玉安:《大善塔应天塔志古》，《绍兴文化杂识》页31，中华书局，2001年。综上可知，大善塔庆元三年被焚毁，绍定元年重修，塔主体为南宋建筑，并有明清维修的痕迹。

报恩寺塔、六和塔等巨塔相比，规模差异明显〔图十二〕。

就施高台基的塔而言，石塔较砖塔基座更为复杂，南宋较北宋更为复杂。北宋时期石塔基座分上下两部分，下部为牙脚和矮束腰组合，上部为壶门(高束腰)组合，如瑞安观音寺石塔[1]；而砖塔基座只做一组，常见上下多层叠涩加束腰的形式，如松阳延庆寺塔、仙居福应山塔[2]。南宋绍兴年间的天封塔地宫铜殿仍做上下叠涩的基座，淳熙以后，多以须弥座为基，如金华南宋郑刚中墓须弥座式封土[3]，砖塔上甚至出现两组须弥座相叠的样式，与《营造法式》石作制度图样"阶基叠涩坐角柱"[4]相类，如乐清东塔[5]，石塔基座甚至作三组相叠，如丽水灵鹫寺石塔[6]〔图十三〕。

2. 柱枋

外檐柱形也包含圆柱、瓜楞柱及抹角方柱等类型。与两浙西路常用圆柱相比，两浙东路最常见的柱形为抹角方柱，有时被研究者判断为八角倚柱，多用于六边形砖塔转角位置，如松阳延庆寺塔、仙居南

‹1› 观音寺石塔塔身有"熙宁元年(1068)六月二十一日"的题记，结合塔身形制，可认为北宋熙宁年间为观音寺石塔的建塔时间。同期相似地域还有垟坑石塔，根据塔身题记"熙宁四季(1071)辛亥九月戊戌朔初六日丁亥故书于耳"，可知其也建于熙宁年间。叶挺铸：《浙江瑞安垟坑石塔的构造和建筑特征》，《东方博物》第18辑，页82—87，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张景修：《尽美亭记》元祐九年(1094)"仙居邑之美者也，而山尽焉，福应山之美者也，而一亭尽焉。尽美亭者，非尽一山之谓，尽一邑之谓也。……山距城二里，峥嵘独秀，浮图居其上，而亭居浮图之南，予名之曰尽美矣。……于是又知福应山者，皇祐间令枢密直学士陈公述古名之也，陈公贤先生劝学文垂于世。踰四十年，公实作是亭"。(万历)《仙居县志》卷一二，页40。杨新平：《仙居三塔及其文化内涵》，《东方博物》第2辑页266，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杨新平先生指出，《古今图书集成》台州部福应山条"宋皇祐间县令陈襄令邑人建浮屠于上"，而陈襄任仙居县令的时间是自庆历八年至皇祐三年(1048—1051年)，故认为该塔建于这三年间。结合县志中《尽美亭记》，认为皇祐年间建塔，四十年后建尽美亭的可能性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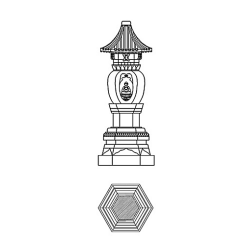
‹3› 前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页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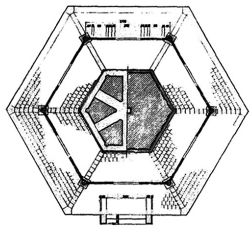
‹4› 前揭李诫编修，梁思成注释《营造法式注释》，页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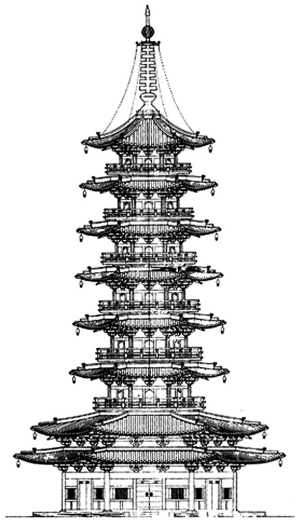
‹5› "东塔院在县治东塔山上，旧时九牛山尖有塔为雷震，圮，宋熙宁间葛令逢改迁此，以童谣云，'青龙有角财富足，青龙有声井邑兴'，时有僧梅塔主者建塔九层，仍建塔院，设钟鼓，有僧子贤夹径莳松竹荫翳，宋无赐额，附藉七宝院。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朔，景云现于塔，明年王十朋廷对第一。绍兴末几废，淳熙中赵令彦炜袁令采兴建，后属白鹤寺子院。国朝洪武十八年，僧善爽重修，佛宇见存，旧无僧并。《记文》宋将仕郎毛士龙撰，……绍兴丙子十月朔旦，祥云五彩，下覆其巅。越明年，詹事主公廷对，为天下第一，节槩凛凛，盖秀气所钟也。未几，七宝主僧义怀以其□子附院籍，攘其田，童其山，徒散屋圮，塔遂零落，邑用不宁。淳熙乙未(二年，1175)，父老相与求直于官，嗣义怀者曰'忠礼'出而力争，卒以众怒而逃。既而令赵公按《图经》证诸疆界，悉以故业归之。……于是进士朱谦之为创三门，汤修鸠材以助，施者益众。以戊戌(即淳熙五年1178)九月，堂殿成，周以廊庑、厨庖、馆湢。塔即其旁。……。父老喜风土，仍旧观，合众德，公而语余曰：'时节夤缘，若有定数。山之否去，邑之泰来，啐喙谓时相值遇。自塔钟坏，屡更铸，丁酉春会成而声清越。令君适至，年谷荐登，财赋告足，百废具举，焕然一新，有声夙讖，殆验于斯。虽然，轮奂美矣，如无额何？'异曰：'复有义怀者出，得不隳前功乎？顾山之废，吾邑利害是切，僧何预焉。幸令君与我请额于朝而异之，岂惟山之宠云。'余具以告，公诺之。父老更相贺，命余书，庸忍辞。淳熙六年十月记。"(永乐)《乐清县志》卷五，页20—22。李小宁：《乐清东塔维修设计解析》，《华东建筑》2006年第11期。另据塔身舍砖题记"毛士龙"、"毛士龙再舍砖一万、" "毛士龙再舍砖一万八千片"等，可与上述文献呼应，即知塔始建于熙宁，淳熙五年重修而成。现存塔身应主要保存了南宋时期的面貌。

‹6› 吴志标：《浙江丽水灵鹫寺石塔》，《东方博物》第30辑，页6—14，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灵鹫寺石塔原为七座，现仅存四座。根据塔身题刻，可知其建于南宋嘉定九年至十一年(1216—1218)。

〔图十二〕两浙东路多边形塔基座及塔身比例图
1. 栖真寺五佛塔　采自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材料
2. 松阳延庆寺塔　采自黄滋:《浙江松阳延庆寺塔构造分析》,《文物》1991年第11期，页86
3. 垟坑石塔　采自叶挺铸:《浙江瑞安垟坑石塔的构造和建筑特征》,《东方博物》页86，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国安寺石塔　采自《浙江瑞安垟坑石塔的构造和建筑特征》，前揭《东方博物》页86
5. 宁波二灵塔　采自杨晓维:《宁波二灵塔的建造艺术及内涵价值》,《浙江建筑》第33卷第1期，页6－7
6. 乐清东塔　采自李小宁:《乐清东塔维修设计解析》,《华中建筑》2006年第11期，页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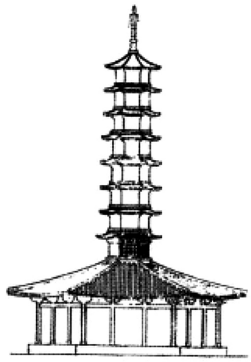

1. 平阳栖真寺五佛塔




2. 松阳延庆寺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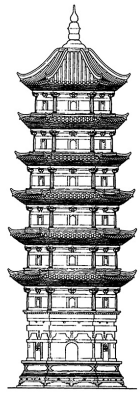
3. 瑞安垟坑石塔




4. 温州龙湾国安寺石塔




5. 宁波二灵塔




6. 乐清东塔

峰塔‹1›等。此外还有少量石塔使用与六边形塔对应的六角柱如温州国安寺石塔‹2›、瑞安观音寺石塔、瑞安垟坑石塔。抹角方柱（八角柱）与六角柱可从露出塔壁的柱面进行区分〔图十四〕。

两浙东路塔下常做高基座，塔身不落地，因

〔图十三〕砖石塔基座对比图


1. 平阳栖真寺五佛塔


2. 松阳延庆寺塔


3. 瑞安观音寺石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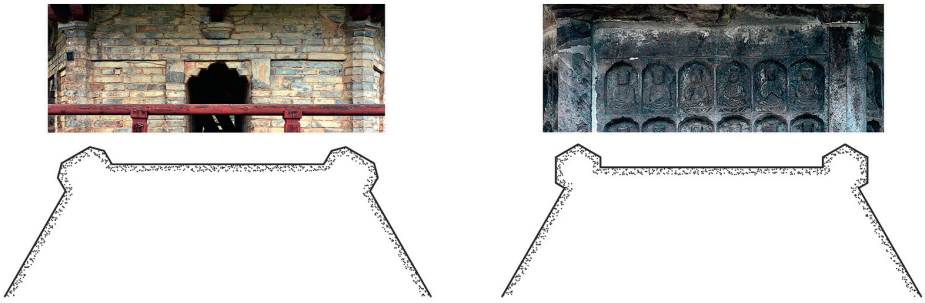

4. 乐清东塔


5. 丽水灵鹫寺石塔

‹1›　“兴道院（禅院），在县南三里南峰之上，旧名兴善，宋庆历中建，治平三年（1066）改今额，上有浮图曰南塔及涵清亭”。（光绪）《仙居志》卷二三，页9。前揭杨新平《仙居三塔及其文化内涵》。杨新平先生在勘测南峰塔时，在“第二、三层砖上分别发现‘天圣十年九月□□□’即公元1032年和‘□记明道二年七月十八□’即公元1033年的铭文，证明南峰塔早在北宋天圣、明道年间就已鼎建”。结合县志中记载陈襄有《兴道院南塔》诗，可确定塔应建成于皇祐以前。

‹2›　1987年国安寺千佛塔落架大修时，发现塔内多块青石碑，根据碑文及塔内出土钱币，可知塔建于北宋元祐五年至八年间（1090－1093）。方加松:《国安寺千佛石塔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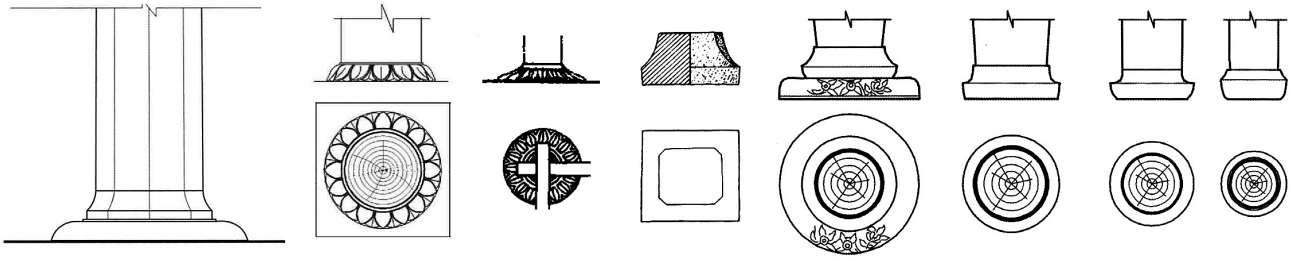
〔图十四〕两浙东路方形抹角柱与六角柱对比图
作者绘



1. 松阳延庆寺塔　　2. 瑞安观音寺石塔

此现存砖石塔实例中较少见到柱础样式。从保国寺大殿‹1›、观音殿‹2›的柱础研究可知该区域在北宋时期为覆盆柱础，上部可能带有柱𣏌。覆盆柱础还可见于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南宋银殿及元代武义延福寺大殿‹3›。独立施用的𣏌形础在

〔图十五〕两浙东路柱形及柱础形制图
1. 保国寺大殿（柱础复原图）　采自张十庆：《宁波保国寺大殿勘测分析与基础研究》，页94
2. 保国寺观音殿柱础　采自沈惠耀：《保国寺观音殿的石质莲花覆盆柱础略考》
3. 天封塔地宫出土银殿柱础　改绘自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图十二、图十三
4. 云和正屏山南宋墓出土柱础　采自浙江文物考古所编：《浙江宋墓》页145
5. 武义延福寺大殿柱础　采自黄滋：《元代木构延福寺》页54



1. 保国寺大殿柱础　2. 保国寺观音殿　3. 天封塔地宫出土银殿柱础　4. 云和正屏山南宋墓出土柱础　5. 武义延福寺大殿柱础

南宋后出现，如乐清东塔、云和正屏山南宋墓‹4›、武义延福寺大殿等。此外也见鼓形柱础，如绍兴大善塔〔图十五〕。

阑额断面多为矩形，一般至角不出头，栌斗底常宽于阑额。一般不施普拍方，在浦江龙德寺塔的平坐层和室内见有普拍方，至北宋元祐七年（1092）的诸暨东化成寺塔‹5›上首次出现外檐檐下普拍方，且至角出头。到南宋后期，檐下普拍方更为常见，如宁波东钱湖南宋石刻‹6›、绍兴兰若寺南宋墓地等。根据

‹1›　张十庆主编：《宁波保国寺大殿勘测分析与基础研究》页94，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沈惠耀：《保国寺观音殿的石质莲花覆盆柱础略考》，《保国寺大殿建成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2013年年会论文集》，宁波，2018年。

‹3›　前揭黄滋主编《元代木构延福寺》，页54。

‹4›　前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宋墓》，页145。

‹5›　“东化城寺，梁大同二年（536）建，唐会昌间废，宋开宝四年（971）重建，名紫岩院，后改今额，康熙年间，诗僧元璟驻锡于此。寺后山巅有东化成寺塔，宋元祐壬申建，名元祐塔”。（光绪）《诸暨县志》卷九，页9。“元祐塔，在枫桥东南化城寺，宋时建”。（乾隆）《绍兴府志》卷四〇，页19。塔身多处见有铭文砖“壬申元祐七年立”的字样，据此可知东化成寺塔建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

‹6›　杨古城、龚国荣：《南宋石雕》，宁波出版社，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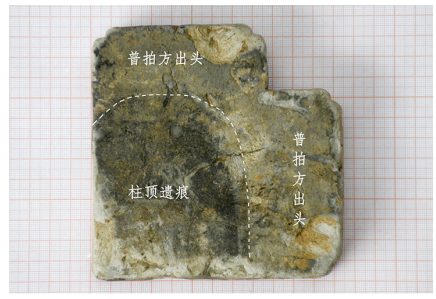
兰若寺南宋墓地出土的普拍方构件看，其至角出头，并作海棠卷瓣〔图十六〕。

〔图十六〕两浙东路普拍方使用情况
小图4采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资料，其余为作者摄


1. 浦江龙德寺塔


2. 诸暨东化城寺塔


3. 宁波东钱湖南宋石刻



4. 绍兴兰若寺南宋墓葬陶质阙楼

3. 铺作

从铺作布局看，北宋至南宋初年一般五铺作及以上用两朵，四铺作或斗口跳用一朵，但并未形成定式，如松阳延庆寺塔‹1›、义乌大安寺塔等施五铺作反只用一朵补间铺作。从金华天宁寺大殿、武义延福寺大殿皆施三朵铺作看，南宋以后补间铺作有增多的趋势。进一步对多层塔的铺作布局进行分析，平坐铺作的施用与塔基形制存在对应关系，施高台基(须弥座)的塔不用平坐铺作，而以叠涩承托。而施宽大台基的塔即仿木构楼阁式塔则出平坐层，其平坐铺作常减上屋一跳，如义乌大安寺塔、绍兴大善塔，可能与其模仿地面木构楼阁建筑的做法有关。

从铺作与柱梁的交接关系看，北宋时期常见柱头、补间的栌斗皆用圜斗的组合，也有柱头用方形抹角斗(八角斗)、补间用讹角斗如松阳延庆寺塔、乐清东塔，或者柱头补间均为方斗如诸暨东化成寺塔‹2›。南宋以后圆柱、方斗开始逐渐普及，柱头圜斗、补间方斗的形制组合开始出现，如义乌大安寺塔、绍兴大善塔，南宋后期到元代则柱头、补间均用方斗。此外北宋时期已开始施用插栱，但其多用于室内，南宋后插栱开始用于建筑外檐，如宁波天封塔地宫铜殿、宁波横省石牌坊等〔图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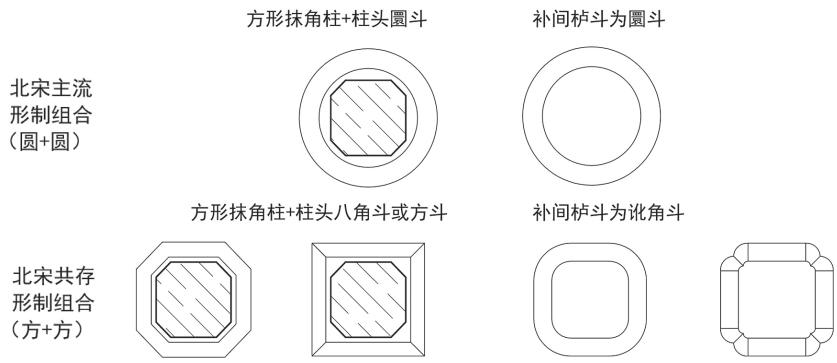
从铺作与檐部交接关系看，以斗口跳或令栱承撩檐方为本地区主流形制，北宋前期出现过耍头做法，如保国寺大殿，但并不常见。南宋以后，爵头状耍头出现，如宝胜寺双塔，至南宋后期更为多见，

‹1› (宋)朱琳《延庆寺塔记》：“……发大誓愿建塔二区，为国祈福。一在永嘉之龙翔，一在本乡之延庆。此寺初号云龙，至是改赐今额，时海内又安，习俗好施，不待劝率，富者轮财，强者效力，巧者献技，凡三年讫工，涌地七成，高二百五十尺，盘固轮焕，甲于东越。经始以咸平己亥(二年，999)，其成盖五年壬寅(1002)也，后五十八年，当皇祐庚寅(二年，1050)，邑人项交富斥私财再新之，至建炎庚戌(四年，1130)，八十一年矣。”(乾隆)《松阳县志》卷一一，页3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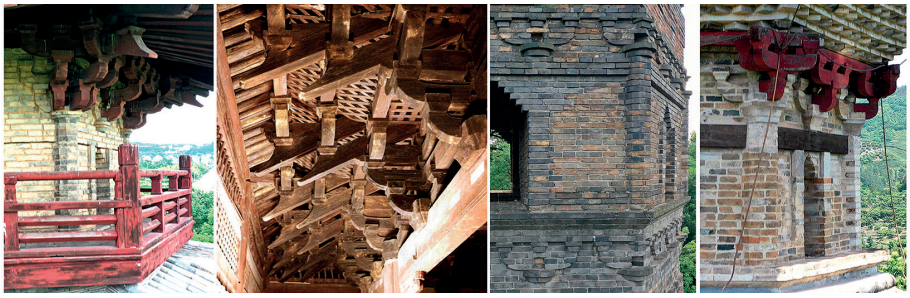
杨新平：《松阳延庆寺宋塔初步研究》，《古建园林技术》1991年第4期；前揭黄滋《浙江松阳延庆寺塔构造分析》；潘树丰、罗俊：《松阳延庆寺塔院宋代古井的发掘》，《东方博物》第24辑，页50－54，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根据学者研究，现存延庆寺塔第七层塔壁素枋上有“淳化五年(994)六月中”砖铭，故认为，松阳延庆寺塔建造年代为淳化五年至咸平五年(994－1002)。

‹2› 若用圆形瓜楞柱，则柱头一般用瓜楞斗，如保国寺大殿、国安寺石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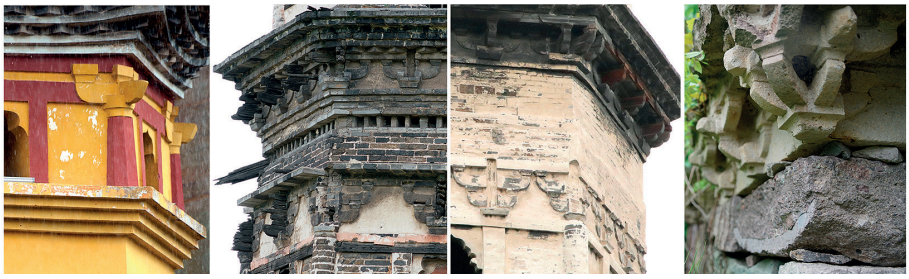
〔图十七〕两浙东路柱形及栌斗形制组合分析图
作者绘



〔图十八〕两浙东路檐下铺作形制对比图



1. 松阳延庆寺塔　2. 宁波保国寺大殿　3. 浦江龙德寺塔　4. 仙居福应塔



5. 平阳宝胜寺双塔　6. 义乌大安寺塔　7. 绍兴大善塔　8. 宁波东钱湖南宋石刻

如东钱湖南宋石刻、兰若寺遗址等〔图十八〕。

从铺作的形制组合来看，该区域常见偷心造，且一直延续至元代。扶壁做法大多与《营造法式》“若偷心”的规定一致‹1›，即四铺作或斗口跳，扶壁作单栱素枋，如湖镇舍利塔‹2›；五铺作单杪单下昂，扶壁作重栱承枋，上承单栱素枋，如横省石牌坊‹3›；六铺作双杪单下昂或单杪双下昂，扶壁作单栱素枋交叠，如庙沟后石牌坊‹4›；七铺作双杪双下昂，扶壁作单栱素枋交叠上承重

‹1›　此类做法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其中横省石牌坊看似反例，为六铺作双杪单下昂，第一跳偷心，但施泥道重栱承素枋，其实际为五铺作单杪单下昂，只是在第一层栌斗的位置做插栱，看似六铺作而已。

‹2›　确认该塔为宋塔。见，贡昌：《浙江金华湖镇舍利塔》，《文物》1987年第11期。“北宋嘉祐三年，当地人江逵捐资重建舍利塔。在塔的第二层、第六层等有多块铭文砖，砖上阳刻楷书‘嘉祐三年戊戌七月江逵重造宝塔’等十四字，纪年确切。赵抃所撰《新建舍利塔铭》也有记载：‘……斯庙有塔，是瞻是崇；完坚弗隳，永焉无穷。嘉祐二祀，素秋之季，建者江氏，铭以为识。’”傅振、赵世飞：《宋塔之美——龙游湖镇舍利塔》，《大匠无名 衢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页61－6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可知塔应建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但其后世修缮情况尚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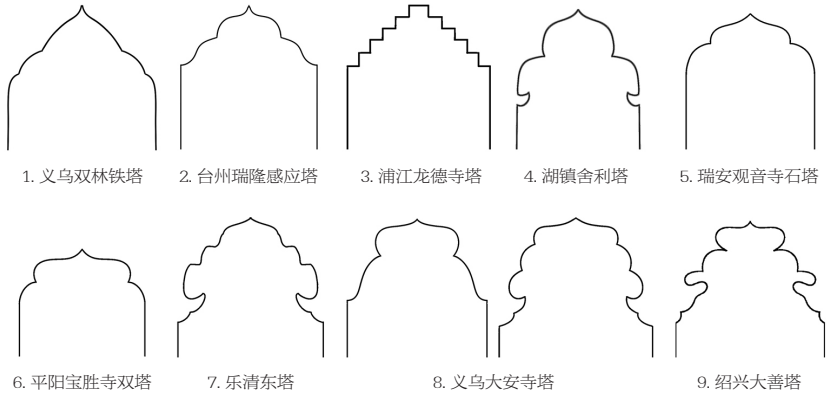
‹3›　《南宋石雕》一书认为横省石牌坊属于史师禾墓地，为南宋绍兴年间建成。“牌坊所在的省岙村，原称窑岙。……这里是南宋时代望族齐国公史弥忠、清代状元施大成的墓地，曾名‘堇山庄’。据鄞东《史氏宗谱》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浙东史氏第四代、乡贡进士史师禾墓地从东钱湖辨利寺山迁此。由于史师禾是赠太师、越国公史诏之子，又是南宋丞相史浩的叔父，就有资格在墓前立牌坊为墓表。”前揭杨古城、龚国荣《南宋石雕》，页115。

‹4›　庙沟后石牌坊尚无准确纪年，根据其阑额出头且使用普拍方，昂嘴较厚，出爵头状耍头等特点可知其约建于南宋后期至元代。

栱[1]。五铺作双杪的扶壁做法，北宋前期作泥道单栱，熙宁以后泥道重栱更为常见。

从铺作构件形制来看，若施昂，作琴面昂，下施双瓣华头子。北宋时期昂嘴较薄，南宋后昂嘴变厚，此后还出现了五边形昂嘴。补间铺作出跳常用单材，直至南宋中后期仍如此。

〔图十九〕两浙东路壶门曲线示意图
作者绘



4. 门窗

区域内少见塔身窗户装饰，而只用壶门。壶门样式刻内凹多曲，砖塔以异形砖拼出弧线，也有直接以砖层层叠涩出壶门者，壶门顶部宝盖曲线常用两层或以上砖组合而成，曲线饱满。北宋嘉祐三年(1058)的湖镇舍利塔在上述壶门基础上，下部出现外凸曲线。南宋以后，壶门形象更加复杂，顶部宝盖明显变矮或内收，如宝胜寺双塔、大善塔等，下段曲线外撇或上卷内凸〔图十九〕。

5. 小结

综上可知，两浙东路地区的建筑形制较为稳定。从存世地面木构建筑观察，其保持了方三间的平面格局，使用“八架椽屋前三椽栿后乳栿用四柱”的不对称构架。塔之平面常见六边形，塔之尺度规模特别是南宋时期较两浙西路明显偏小。塔身有两种做法，一是可登临的楼阁式塔，使用宽大台基，施平坐层；二是不可登临的塔，多作高台基、不施平坐层，其中第二种的存世数量更多。本区内建筑形制变化主要发生在南宋时期。南宋以后，这一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样式，如砖作须弥座、独立柣形础、爵头状耍头等，且壶门形象更加复杂。至南宋中后期，外檐施普拍方、至角出头，补间铺作数增多、补间出跳施足材栱等形制逐渐流行。这一变化过程可能是受到周边地域建筑形制和建筑文化的影响，但其改变过程是渐进的，较为缓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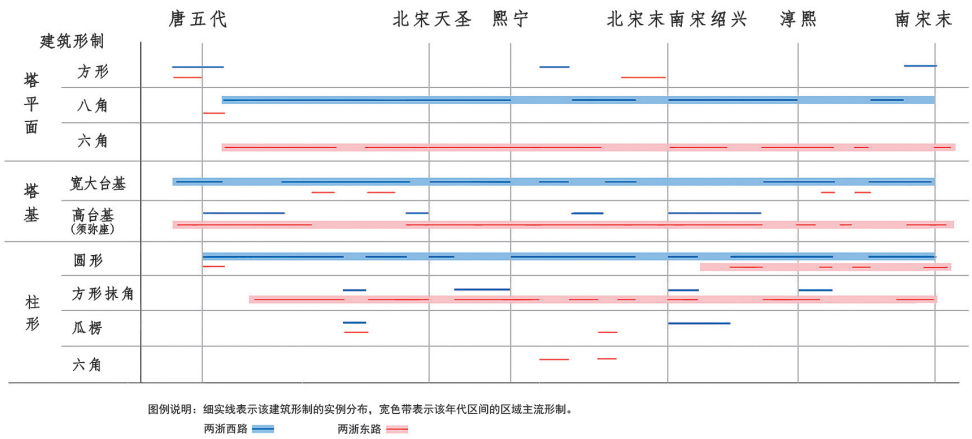
三　从建筑形制看两浙西路与两浙东路之区域互动关系

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地区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气候相似，文化交流频繁，因此其建筑形制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关于这一区域的共性特点，张十庆先生已仔细剖析[2]，包括井字形构架、大尺度心间、丁头栱

‹1›　中国建筑研究室(窦学智执笔)：《余姚保国寺大雄宝殿》，《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前揭郭黛姮《东来第一山——保国寺》。

‹2›　前揭张十庆《〈营造法式〉的技术源流及其与江南建筑的关联探讨》；前揭张十庆《苏州罗汉院大殿复原研究》；张十庆：《江南殿堂间架形制的地域特色》，张复合主编《建筑史》2003年第2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图二十〕反映区域传统和特性的建筑形制
作者绘



与月梁造[1]、栌斗宽于梁、少用普拍方和耍头、柱头圜斗与补间讹角斗的给合形式、阑额上装饰七朱八白的图案等。但从上述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的建筑形制演变情况可知，在一些具体的建筑构件形制或形制组合中，两个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和发展进程，有着各自独立的传承系统，对于新技术、新形制的反应和吸收，也有先后快慢之别，或与各区域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关，也可能反映了不同区域的个性选择，从而呈现出丰富绚烂的建筑面貌。

1. 坚持传统，保留个性

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建筑形制传承，因此其建筑也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图二十〕。从现存实例分析，两个区域至少有以下明确的区域特质：

(1)塔的平面：五代时期，两个区域均有八角塔，而北宋以后，两浙西路以八角形塔为主流，而两浙东路以六角形塔为主流，似反映了两个区域各自的平面偏好。

(2)台基形制所反映的塔类型：两浙西路偏好使用宽大台基、可登临的楼阁式塔。因其可登临，故塔身开门，以便于人进出，平坐下施斗栱悬挑，以扩大回廊宽度，常作砖身木檐，这种塔体量一般较大，可能与其经济实力有关。两浙东路偏好使用高台基(如须弥座)的雕塑式塔，塔身多开龛塑佛，平坐层不施斗栱，作砖塔或石塔，体量相对较小。

(3)柱形及栌斗形式所反映的建造逻辑：两浙西路常用圆柱，与之搭配的是柱头圜斗+补间方斗(含讹角斗)，也见抹角方柱，与之搭配的是柱头方斗+补间方斗的组合，反映了柱形与栌斗形状的一致性关联，并以柱头补间栌斗形制交错跳跃为主流；两浙东路常用方形抹角柱，其上常搭配施柱头圜斗+补间圜斗的组合，或柱头方斗(含方形抹角)+补间方斗(含讹角)的组合，其柱形变化不大，更强调栌斗形统一的设计思想。二者所使用的柱形和栌斗形制相似，但其组织和使用方式却是不同的，有着独立的建造逻辑。

2. 技术渐进，节奏不一

在建筑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两个区域的形制变化进程并不统一〔图二十一〕。两浙东路在很多形制的

‹1› 从现存砖石塔实例来看，月梁造不仅用于木构建筑梁架，也在砖石塔内部有所反映，如龙德寺塔、报恩寺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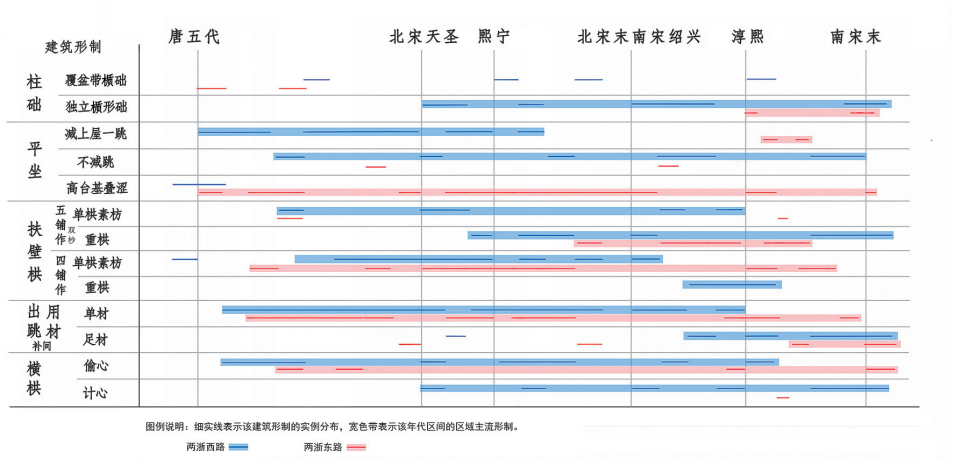
变化上较两浙西路有明显的滞后性，即古制延续更久，新制出现更晚。

(1)独立栀形础在两浙西路北宋时期就出现，南宋以后在砖石塔柱底多有表现，而在两浙东路至南宋淳熙以后才逐渐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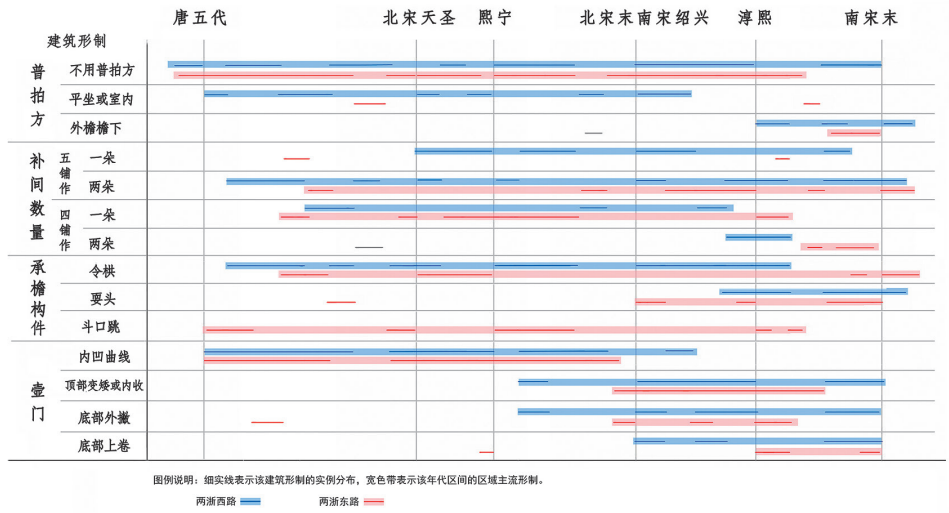
(2)平坐铺作减跳的做法在两浙西路的五代和北宋时期较为流行，南宋以后不再减跳，但从两浙东路存世实例看，大量砖石塔平坐层只出叠涩，南宋后期以后出平坐铺作并减跳的做法似才稳定下来。

(3)两浙西路在南宋以后，四铺作扶壁栱开始流行使用重栱，反映了扶壁做法由“单栱”向“重栱”的转变过程，而两浙东路直至南宋后期四铺作扶壁仍用单栱。

〔图二十一〕反映区域发展进程差异的建筑形制
作者绘



〔图二十二〕变化趋同的建筑形制
作者绘



(4)两浙西路于南宋绍兴时期出现补间铺作出跳用足材的做法，其后愈加普遍，而两浙东路于南宋末年才逐渐流行。

(5)两浙西路南宋以后多用计心造，而两浙东路直至元代仍见偷心造。

由此可见，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地区各有其建筑发展的路径和节奏，其中新形制和做法在两浙西路的发展较为迅速，而在两浙东路相对缓慢，或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有关。

3. 时代影响，变革趋同

在研究中还发现一些形制在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生改变，且改变趋势相近〔图二十二〕。这样的现象提示我们或许是由于共同的因素所促成。

(1)塔基须弥座：南宋以后须弥座有流行的趋势。两浙西路体现在须弥座出现于楼阁式砖塔底部，如报恩寺塔，而两浙东路则出现砖塔施两重须弥座、石塔甚至施三重须弥座的做法。

(2)普拍方：北宋主要用于平坐层，鲜见于檐下，南宋以后使用位置和频率逐渐增多。两浙西路南宋时期出现普拍方，至元代广为施用；两浙东路北宋中后期即出现将普拍方用于建筑外檐的实例，至南宋后期外檐施用普拍方的实例开始增多。

(3)补间铺作：南宋以后补间铺作数量逐渐增多。两浙西路南宋以后四铺作补间出现两朵，不再因出跳少而减少补间铺作，至元代以后补间铺作更出现三朵、四朵的情况，如真如寺大殿、东山轩辕宫；两浙东路地区南宋时期也有补间铺作增多的现象，如天封塔地宫殿不出跳仍用补间铺作两朵，至元代补间铺作出现三朵的情况，如天宁寺大殿、延福寺大殿。

(4)耍头：南宋初年，两个区域均出现爵头状耍头的形制，至南宋后期出耍头的做法逐渐取代令栱或斗口跳承檐的方式，成为较为常见的形制。

(5)壶门形制：壶门形制逐渐复杂，南宋时期上段曲线变矮或内收，下段出现外撇或向上卷凸，在两个地区均发生变化。

从形制分析可见，两宋之际是两浙路地区急剧变化的时期，或许与宋都南迁和《营造法式》的重刊有关，极大地改变了区域建筑的主流形制，也影响了建筑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建筑技术的自然演进发展不同，因人口流动、社会剧变所带来的影响不再局限于一区一地，而是各地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

四　关于建筑文化区域研究的思考

早在春秋时期，江南地区就已形成吴、越对峙的局面。东汉顺帝时，第一次以钱塘江为界分浙江以东为会稽，浙江以西为吴郡，从而确定了这两个区域的地理分界，形成了“浙东”、“浙西”的地域概念，也固化了区域的内部认同。政区的设置往往与已形成的区域文化密切相关。从唐代浙江东、西道，宋代两浙东、西路的分合，可见这一区域文化和分区界隔已非常稳定。

从两宋时期两浙路地区的建筑形制看，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各有其建筑文化传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即使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建筑构件，其组合方式却是不同的。在建筑形制发展演变的进程中，两个区域表现并不均衡，其形制革新、替换、反复，甚至出现此消彼长的复杂态势，皆反映了区域的选择。

我们看到两浙西路的建筑形制变化更加频繁和活跃，而两浙东路则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表明建筑形制的演变与区域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1]，可能反映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南宋时期两个区域一些建筑形制出现趋同性变化，或反映了大量北方移民南下和《营造法式》再刊的影响。

‹1›　“两浙路东、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浙西地区如杭、苏、湖、秀等州府，工商业发达，城市经济异常繁荣。……到熙丰年间，其城市人口已有十九万户，年商税额万多贯，居全国州级城市第7位。而浙东地区如严州、处州等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的州县发展却较为缓慢”。前揭倪佳佳《〈宋史·地理志〉两浙路考述》，页16。

综上，“不宜以‘江南建筑’一概而论苏浙建筑”，其根本原因在于浙西和浙东的区域文化既有共性延续，又各有其区域特质。两个区域的建筑特色和建筑形制发展有着较强的独立性，故分区研究的价值就此体现。与这一区域研究相似的是，笔者曾在四川宋元建筑研究中发现川北和川西的建筑体系差异，其实为利州路和成都府路之别，也曾对北方晋东南、晋西南地区开展区域对比，发现区域自然资源条件、政治经济因素、历史交通路线、行政区划变革在区域互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1›。通过开展区域建筑形制的谱系研究，进而探讨区域互动关系，是建筑史研究的重要拓展领域，也是古代建筑研究能“透物见人”的重要途经‹2›。

根据本文的研究探索可知，历史行政区划的划定与自然地理条件和区域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此，历史行政区划对于建筑文化的分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以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为界限进行建筑分区分期的研究，并探讨区域间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可能是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方式，也能够发现和解决更多建筑史的问题。

［作者单位：王书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徐新云，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徐怡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王书林：《四川宋元时期的汉式寺庙建筑》，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徐新云：《临汾、运城地区的宋金元寺庙建筑》，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师生长期坚持开展建筑形制类型学理论方法的探索与实践，新发现或鉴定了多处重要的宋金建筑实例，形成了一批区域建筑形制谱系和渊源流变的综合研究成果，从古建筑的角度为更深入的历史问题探讨提供线索。相关研究方法和成果总结参见，徐怡涛：《文物建筑形制年代学研究原理与单体建筑断代方法》，《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二辑，页487—49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徐怡涛：《试论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学术根基的建筑考古学》，《建筑遗产》2018年第2期。